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12月14日,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举行第11期青年博士论坛。本次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主题,来自校(院)教研部门的青年博士代表结合学习研究体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交流发言。本期刊登论坛发言,以飨读者。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郭培培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对其作了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课题,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鲜明特征。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才能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通达真理、体系完备的科学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指导我们的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了文化建设的规律,聚焦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任务,努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文化思想领域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重构。习近平文化思想涉及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工作布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重大意义等多方面,体系完备、论述全面。

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推进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化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探索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原创性论断。比如,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的重大论断,形成“四个自信”的重大理论创新;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命题,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性、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深刻揭示了其通达真理、体系完备的科学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服务人民、凝心铸魂的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因此,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品格,标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底色。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如何推进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文化建设的人民性。“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导向,才能在思想上凝聚最大共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依靠谁”“服务谁”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总书记正在定工作时,面对当地文物年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时候,他就严肃指出“我们保管不好(文物古迹),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2016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可见,检验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更体现了我们党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丰富,在推动实践、指导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从“四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从“两个文明”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使命任务”到“新的文化使命”等理论的提出,都彰显了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伟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体”而落入了“用”,“体”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性,“用”展现了这一思想的实践性。

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就必须明白“体”“用”之间的逻辑关系。这里的“体”,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党在百年征程中形成的文化创新理论,体现思想之光、文化之源;这里的“用”,则指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明体达用”指的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运用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大历史观的宏大视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道德哲学再次激活,指明了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强调“七个着力”的要求,鲜明地体现了体用兼备的特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与时俱进、胸怀天下

的开放性。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创新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创新。从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九个坚持”概括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到党的二十大从五个方面重点部署文化建设工作;从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的深刻阐述,到对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指示中“七个着力”的具体要求,无不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生产力,也包含精神生产力,同时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以新的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推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向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源头活水,结合当今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及我国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观察视角,进而进行深刻的理论创造和精神指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关键时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革。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也预示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观点、新战略和新论断成为支撑人民精神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种胸怀天下的思想,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是孤立创造的。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推动自身文化的吸引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之间平等发展、交流互鉴;倡导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试图消除文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主张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在文化上应该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人类的发展是多彩而绚丽的,每种文明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都展现了其独特魅力,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不同文明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示了对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尊重。这一思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华文明,体现了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前瞻性和开放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

刘玉桂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历史性交汇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铸就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时代性、原创性和系统性,赋予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有的理论深度、实践广度和现实鲜活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背景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背景角度进行阐释,国际背景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背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可以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世界之变主要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趋于放缓,国际贸易增长缓慢,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时代之变主要指数字技术推动产业发生革命性变革,对世界分工格局的重塑,由此科技、教育和人才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而气候问题、能源危机和移民等问题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了挑战。历史之变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格局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将我国视为竞争对手使得我国周边环境日趋复杂。

面对上述变局我国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如何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在具体应对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领域的供给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人民群众需求旺盛的高品质文化产品供给较少。如何生产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就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对这一问题探索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自2010年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总量和规模一直在增加,但文化软实力与我国经济地位和实力不匹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文化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长期不匹配,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成为未来一项重要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促进文化软实力提升过程中成熟发展起来的。【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非正式治理模式及其效能提升研究(AHSKQ2021D81)阶段性成果】

今年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总结备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直接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在联系,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高度凝练的概括性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立足于中国实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文化发展、文化建设规律,形成文化理论,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活态流变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演变也同样如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被拉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到“统筹全局而全变之”的戊戌变法,再到“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早期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流是“否定传统、肯定西来”,这主要是由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特殊时代条件以及当时情势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所决定。但即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仍然有很多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客观分析的冷静态度。

比如李大钊同志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极对峙的语境之中就保持了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认为,新旧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立的坚操”。在当时东西文化的碰撞与比较之中,李大钊说:“愿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新文化的精神。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同志和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在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包括后来向大众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中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相容、相通的契合性,在此时就已初现端倪。

毛泽东同志也在很早就显露出融糅中西的倾向,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在讨论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中也称:“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基本政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阶段,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共产党人贯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扬弃和创新的原则,中共八大决议强调:“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文化,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也开始有计划的整理古籍,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1960年毛泽东同志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专门谈到“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意味着强调不能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进程中,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1990年5月,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这时的共产党人,也开始陆续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精神等做出阐述,比如江泽民同志提到的:“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智慧、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了中华文明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时期也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始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出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从不同维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正是基于历史、理论、实践等多重逻辑,才有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才有了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高度总结。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只有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最能为人直观感知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但“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僵化与停滞”,反而内含“发展与变迁”。

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创新的描述由来已久。从《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始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回顾历史上的“狄狄造酒”、“夏鲧作城”、“鲁班作锯”,小到人们衣食住行各种工艺技术的创新,大到水利工程等民生工程,还有对世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无一不是创新的成果。

突出的统一性。纵览中国历史,尽管出现过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等分裂乱世,但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这些分裂而断裂,而是在凝聚融合中形成了“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过去,以历史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与如今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涵上的古今之别,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并没有改变。

突出的包容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化多样性就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直观呈现。《礼记·礼运》中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很早就萌生出极具包容性的“天下一家”的“天下观”。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所言:“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中华文明不仅能包容来自其他文明的元素,更能吸收这些元素化为己用,使之汇入中华文明的体系中。

突出的和平性。“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在中国古代,“和”的概念产生很早,《国语·郑语》中就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事物彼此和谐,则能生成万物,若事物完全趋同单一,反而无法持续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寓意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要追求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中华文明对“和”的理解与追求,在当今世界依然可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人文基础。

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总结虽然简洁直观,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也不是孤立的表象呈现,反而构成了内在交织的,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因果辩证的有机系统。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的概括清晰呈现了它们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与互促关系,清晰呈现了中华文明在历经沧桑后仍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内在动力,清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所在。

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突出特性

沈晓薇